

上海辐射与近代苏南地区思想观念的嬗变

孙海泉

由于受上海的辐射,近代苏南地区促动思想观念嬗变的因素如经济基础的变迁、近代教育的兴盛、科学知识的昌明等已经具备,变是必然的!而思想观念的嬗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思想观念的嬗变确立起可以考察的指标,本文试从上海辐射的角度对民国时期苏南地区思想观念嬗变的指标和嬗变概况作一简论,刍荛之见,方家正之。

一、文化观

文化观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内容,其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在思想观念的嬗变中起着导航作用,它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言行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自应成为考察思想观念嬗变的重要标志。

开埠后的上海,文化观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多元的世界文化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兼容性的文化观念。在苏南地区,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也在日渐淡薄,人们已经认识到,西方并非一无是处,西学亦能为我所用,一种新的文化观正处于妊娠之中。1861年,苏州府的冯桂芬因其出入过“夷场”而早识时务,在其《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表明新的文化观成熟了,夷夏之辨遂为中体西用所取代。

中学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此凡种种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西学则系指“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等物。但在苏南地区,由于近代以来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文化

教育事业的传播,西学早已突破了这一框框。在政治文化观上,一篇题为《论创行议院事》的文章写道:“议政院一举,泰西及美洲诸国固创行已久。各国议院,或仅一座或分为二座。分为二座者即上议院及下议院。俄、普两国,大事均由议院商酌,而国君仍得主裁其间。若英国之君,名虽可改议院之决议,其实则不能不依者,盖下议院之议员,即为民间所举,则必郑重其事,而后升之于公。以故国家政治,即民人亦得参与其间焉”。^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西方政治体制之羡慕。这是对传统政治文化观神圣权威的挑战。

在文化价值观上,反对崇古、法先王的传统价值观,提倡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崇古、法先王,在儒家的典籍中,赞颂先王的词句充斥卷帙。《论语》中有“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记载,要求唯先王之道是从,对先王时代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我们考察上海开埠后苏南地区的文化价值观时发现,其追求的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上年李相(指李鸿章——笔者注)曾有在金陵试行开矿之议。是役也,众商人闻之,无不称善,皆以为法良意美,在所必行”。^②又如,“近来中国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卒无可以胜于西人之处,其故何哉?盖由官办而非商办之故也。……若不归官办而归商办,则商人既以制器必精,可得善价。而工匠等亦或独自运用其技能制造,使美者益求其美,精者益求其精。各逞心思,各竭才力。因而运驾乎西人之上,当不难矣!”^③

在伦理道德观上。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于汉代,董仲舒对此作了发挥解释,形成了“三纲五常”的说教,“三纲五常”的伦理又使道德观凝固化、教条化、绝对化,它要求关系的一方绝对服从于另一方的特权,绝对履行另一方的义务,它为区分尊卑等级制度奠定了基础,并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讲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以及忠孝观念是其具体的体现。然而上海开埠后的苏南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文化观上,明显地背离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提倡女学,追求自由婚姻就是对妇女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挑战,他们纷纷著文抨击,“吾国风尚,男女婚嫁主权,悉操父母之手,或为势力压迫,或为礼教束缚,……有弊无利。”^⑤“男女是一样的,男子妻死或离婚后复娶,没有人看不起,为什么女子夫死或离婚后复嫁,就要被人看不起呢?那不过数千年相传的恶习罢了!”^⑥

总的而言,在“中体西用”的伦理下,中学没有被摈弃,西学又得以推崇。在苏南地区,一种中西并存的文化观形成了。

随着对西学了解日深,苏南地区对西学推崇日甚。极力主张采西法,废科举,求人才。然而,西洋科技日新月异,只有身处异国他乡,耳闻目睹,潜移默化,躬亲其事,递相授师,才能学到真正的西学,19世纪80年代后,苏南地区的有识之士开始奔赴异国他乡学习深造。以苏州为例,据姚永新的统计,1894-1949年的半个世纪中,苏州先后奔赴他国的留学生达966名,其中留学美国者451名、留学日本者314名、留学法国者59名、留学英国者57名、留学德国者49名、留学比利时者13名、留学苏联者6名、留学意大利、加拿大者各4名、留学奥地利者3名、留学菲律宾、瑞士者各2名、留学西班牙、捷克者各1名。所学专业涉及军事、外交、政法、财经、教育、生物、理化、医药、农林畜牧、天文、地理、地质、海洋、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艺术、神学等多个领域。^⑦

轰轰烈烈的留学运动再一次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上海开埠后,苏南地区的文化观念已发生了一场革命。与此同时,随着身处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把新知识、新文化传播到苏南地区,一场更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的革命即将到来,它将无情地荡涤传统的思想观念,推动苏南地区的现代化事业。

二、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虽然不是思想观念本身,但思想观念的嬗变是通过它们来反映的,它们把本来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变得清晰、具体,具有了可考察性。

晚清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城市,追逐西俗已成为部分上海人的一种时髦:“云髻新编脑后拖,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风送芳香扑鼻过。”^⑧这首诗使上海人日常生活的趋时化特征跃然纸上。

受上海辐射,近世以来,苏南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亦明显地带有趋时化的特征:

服饰 吟喇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有如下的一段记载:“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特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⑨这是吟喇对传统中国人,确切地说,是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服饰的直观描写,但上海开埠后,欧风日侵,苏南地区的服饰开始大为改观,一种追逐西化的趋势锐不可挡。

首先是社会上层人物的变化。“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⑩这与苏南地区多买办不无关联。由于这些买办到20世纪的20-30年代,已成为上海滩上最受人羡慕的职业,他们西装革履,呢帽手杖。这无形影响了那些梦求成为买办的社会上层人物。继之则是知识阶层的变化,教师摈弃穿着多年的马褂,改着中山装,部分的改着西装;学生装也改为衣袖身腰窄小的短装。最后是一般民众的变化,“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袭,以示

维新。下此衣食艰难之辈，亦多舍自制之草帽，而购外来之草帽，今夏购草帽之狂热，竟较之买公债券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⑬

服饰的趋时化还反映在衣服式样的不断翻新上。以金山县张堰镇为例，服饰式样的翻新常常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衣服之制，历来宽长，雅尚质朴，即绅富亦鲜服绸缎。咸丰以来，渐起奢侈，制尚紧短。同治年间又尚宽长，马褂长至二尺五、六寸，谓之湖南褂（时行营哨官、管带皆宽袍长褂，多湘产，故云）。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臂不过尺二、三寸，且仿洋装，制如其体；妇女亦短衣窄袖（先行长至二尺八、九寸），胫衣口仅三寸许（先行长至二、三寸），外不障裙（女子十七、八犹辫，而不梳髻，不缠足，遵天足会也），尤近今风尚之变”。^⑭民国以后，欧美的服饰传入苏南，使服饰的翻新更快。

鞋式的更新是伴随着妇女的天足运动同时演进的。近代以来，外国人来华日增，他们对中国妇女缠足的这种野蛮、奇异行为感到惊讶和不解，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帮助中国妇女早日摆脱缠足的恶习，纷纷通过具有慈善性质的不缠足运动和设立天足会来解除中国妇女的痛苦，1895年英国女传教士立德夫人在上海组织传教士设立了天足会总会，又在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京等地设立了分会，天足会发行宣传品、组织演说、有奖征文等活动，广泛宣传不缠足的好处，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受到预期的效果，就是清末虽有太后懿旨放足，然近千年之习俗，相沿成风，安能除于一朝？民国初年，政府再次劝谕放足，然成效不佳。五四以后，随着女学之兴盛，妇女放足方见成效，在苏州的兰陵女学，“青年女子，后竟无缠足者，即中年缠足之妇女者，亦肯解放矣”。^⑮在常州，抗战后，女子不再缠足，据不完全统计，仅江苏省就有近千人放足，其中最长的七十多岁。^⑯妇女天足必然导致鞋式的变更，先是只穿洋袜单跟鞋。^⑰随着欧风美雨的吹打，苏南地区的妇女有模仿西洋妇女者，“穿起高跟尖头的

皮鞋来了”，有人甚至提倡富室千金更进一步，仿西方当时流行的“赤足穿平底圆头鞋”。^⑱

由此可见，在苏南地区，人们由帽子到衣服，由衣服到鞋子都在追逐西洋风气，趋时之风愈吹愈紧，无怪乎时人讥嘲道：“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⑲

饮饌 在饮食上的变化，莫过于人们对西餐的推崇。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有数十家法、俄、英、意等各式的西餐馆，豪富巨贾为了追逐时髦，每逢请客，多喜进西餐馆，导致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效仿，“许多大学生们，他们是不进小馆子的，就是口袋里只剩得几毛车费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馆才放得下心”。^⑳在这儿，人们进西餐馆的目的是多么严重的崇拜症。对此，有学者指出，这“决不表明吃西餐已成为上海人的主体饮食方式，它指向的是一种消费时尚，一种心理趋向与价值目标”。^㉑

上海人的这种消费时尚，心理趋向与价值目标必然影响到附近的苏南地区，“官绅宦室，器必洋式食必西餐无论矣”。^㉒在苏南各城镇，西式餐馆纷纷开设，进西餐馆就食者越来越多。在南汇县，咸丰初年，宴会犹只八簋，“今则多用燕窝鱼翅燔诸品”。^㉓尽管由于开放的程度不同，苏南地区人们的这种消费时尚没有上海人表现得那么强烈，但其趋时化的心理趋向是共同的，这股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吹来的崇洋之风正扑面而来，时人曾有评曰：苏南学上海“无疑地是一种共同的趋向，尤其那些爱时髦的青年男女”，^㉔此评可谓一针见血。

住居 上海人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磁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开埠后，随着大批外国人的到来，他们在上海租地建屋，把西式的建筑和家具带到了上海，在崇洋之风的吹拂下，上海人转喜西式楼房，更爱西式家俱，家中只有红木房间，已觉寻常，非铁床皮榻电风扇，才觉得适意。^㉕这种趋向很快为苏南所接受，在常州，1919—1937年期间，人们开始建造

西式洋房，震华电机厂由德国西门子洋行设计；蚕业商人也从上海招聘工匠建造蚕业公所。^②这一时尚在临近苏南的杭州反映得更为明显，杭州“西湖多别墅，且大率为西式之建筑，有改‘欲把西湖比西子’之下句为‘近来西子作西装’者”。^③

行走 上海开埠后，火车、汽车成了苏南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是铁路和公路。在苏州，原本是主要交通工具的轮船被抛弃了，“开化的旅客现在大多愿意利用铁路管理的良好服务，只有那些不开化的农村人，对他们来说时间并无意义，才仍旧宁愿取道慢而便宜的水路去到上海和无锡”。^④在这里，“不开化”完全可以理解为思想观念转变慢者，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包天笑对苏南地区人民生活的回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在沪宁路上，以三等车最为热闹，数亦最多，”“三等车以农人居多数，向来以肩挑背负上市场的，现在有了火车，省力得多了，车箱中塞满了蔬菜瓜果，还有鱼米鸡豚。……车厢里一时鸡啼此起彼和，令人可笑”。^⑤包天笑尽管觉得可笑，但他却证明了苏南地区人民思想观念在迅速转变。

此外，人们的其他行为也无不体现着这种趋时化。如婚俗。苏南地区旧式婚俗繁琐复杂，规矩颇多，近世以后，人们便提倡仿西式之文明结婚，1906年10月，柳亚子、郑佩宜的婚礼便是仿西式，一时轰动全镇，之后，苏南地区举行西式文明婚礼者比比皆是。后来柳亚子提出更新式的办法：结婚的时候，邀集男女两家至好的亲友，在公共场所，开一个茶话会，由新郎新娘自己发表结婚的经过，或请有学问的名人演讲结婚的意义。会毕大家散去，让新郎新娘自由还家。以后便可举行蜜月旅行……增长见识，涵泳爱情了。^⑥

语言 苏南人追逐时髦话，在盛泽，“从京里来，自有一翻京话；从海上来，自有一翻海话，把听的人，如坠云里雾中”，洋来洋去，足见一个洋字很时髦。^⑦昔日“乡音未改鬓毛衰”已不见了踪影。

总之，上海开埠后，苏南地人们日常生活的趋时化是明显的，这是思想观念嬗变的结果，其情形在一幅文字漫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个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鞋，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了几句义务话”。^⑧

三、社会思潮

本文旨在考察上海开埠后苏南地区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不是这一地区少数思想家的思想，思想家们思想的超前性不能等于这个区域广大民众思想的普遍性，本文认为能反映区域广大民众思想普遍性的最佳指标就是社会思潮。

在上海开埠后的苏南地区，由于“义利”之辨的传统价值观被突破，重商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已在情理之中。

在上海，开埠后洋行的建立，对华贸易迅速增长、买办地位的日益显赫，无不促动着重商主义思潮的兴盛。到本世纪初，重商主义的社会思潮在上海更是铺天盖地，人们认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与民命脉之所系也”，^⑨“欲国之富，惟赖于经商，而欲经商之有效，必使人人有营业思想”；^⑩“商人在现世界为最要之人物，国家之强富视此为转移”；^⑪“资本家者，国家致富之要素也。一国之资本家多，则农工商业可以振兴而国富；一国之资本家少，则农工商业不易发达而国贫”。^⑫难能可贵不是人们意识得到经商可以致富，而是人们已经意识到要致富则必须首先要有“营业思想”，对于历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过渡而言，这是一种新的思潮的涌动。

苏南地区临近上海，最早感受到上海这一全国商业中心的辐射力，于是一批知识分子遂起而倡言重商主义，更有一批有识之士不再坐而言者，他们成为起而行者。

出生于苏州教师家庭的王韬，对“重本抑末”进行了尖锐的批驳，在他王韬看来，封建政府的“重农”，实质是为了“丈田征赋，催科取租”，是“农工虎狼”，国家焉能富强，遂倡言“恃

商为国本”的重商主义。

在具体措施上,王韬也有自己的系统理论,他说:“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③“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④“如造轮船、制机器、设银肆、开煤铁五金诸矿,出洋行贾、轮船驶于内河、许民设立公司,听其自为”。^⑤可见,王韬发展商务的办法主要是允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为。

无锡的薛福成也是重商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国家要富强首在重商务,“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⑥“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⑦要发展商务则必须提高商人的地位,于是他提出了“商握四民之纲”,又说“夫商为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发之纲者,商也”。^⑧至于发展商务的具体办法,薛福成也认为最好是创办公司,“鸠集公司之一法……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⑨并希望公司归商办,“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⑩

重商主义思潮的风靡犹如一根无形的皮鞭,驱赶着人们去追逐利润,这在时人的诗中得到了证实:“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千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农家置纺车,无复有心利菽粟”。^⑪尽管这是描写的南浔镇的情形,但这亦是临近的苏南地区的缩影,弃农经商已是比比皆是,我们可以从无锡 1923—1929 年商业机构的显著增长中窥见一二,1923 年,无锡有米行等 12 个行业的商业机构 505 家,但到 1929 年,增加到 690 家,平均每年

增加 31 家。^⑫

重商主义思潮对思想观念的冲击莫过于人们择业观的更新。传统“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的观念已被突破,随之而起的是人们“群趋经商”,“同光以后,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⑬如无锡的薛南溟,当过李鸿章的幕僚,后又以候补知县出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员,专办华洋讼事,但在任期间,他曾在无锡产茧乡镇广设茧行,趁上海干茧货源短缺之际,装运上海出售以牟取暴利;又如杨宗濂、杨宗翰兄弟,清末,杨宗濂便官至布政使、按察使、长芦盐运使,杨宗翰也曾随刘铭传抚台,督办台湾行省水陆营务处,但到 1895 年,两兄弟创办了业勤纱厂,走上了工商兼营的道路;苏州的陆润庠是清末状元,曾集股接办了苏纶纱厂,由原来的官督商办改为商办;南汇县的穆藕初,曾在上海海关供职,后于 1914 年在上海收买了一家未建成的纱厂,并于次年建成“德大纱厂”。

在农村,一些罢官绅士在家乡虽未兴办近代工商业,但也经营土地,成为经营地主,如无锡的严紫卿,曾官至山西按察使,1871 年卸任还乡,购置田地,置农具买耕牛种田 30 亩,并诣古携李购桑 3000 株,排种于宅前之南湾,为一方开蚕桑风气之先。^⑭这是择业观更新在农村这一特定条件下的折射。

重商主义所导致的儒商合流、绅商合流现象一方面提高了商人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这又从反面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向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

四、精神风貌

精神风貌是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思想观念的较高层次,其良莠程度不仅左右着思想观念的转变速度,而且左右着思想观念的转变方向,它是思想观念中能对区域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上海人积极开拓进取精神的辐射下,苏南人们的精神风貌也为之一新。在那些有实力的资本集团的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①

这批企业巨擘们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首先应归功于他们新价值观的树立。在传统社会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曾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士农工商的排位使得多少传统的工商业者们失去了自信,对自身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诚如郝延平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商人总是教育他们的子孙通过科举考试来使他们的家庭脱离商人阶层”,^②跻身上层社会,荣宗耀祖。但上海开埠后,随着重商主义思潮的兴盛,这批企业巨擘们认识到了工商业对于立国的重要性,找回自身的价值,鄙视被传统社会最看好的所谓最能体现身份地位的官本位和学历。如1946年,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仁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荣德生“临行再三训迪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他认为“留学归来致力于事业者多有成就,走入政治者多学非所用,一入此途,与猾吏无异,不但无益社会国家,且亦自误,至为可惜,反之若做一农工,有裨于生产也”。^③荣德生在这儿要求子孙不入仕途,认为“走入政治者多学非所用,一入此途,与猾吏无异,”其感受和认识的得来是深刻的,是腐败的封建官僚制度留给他的辛酸,同时,荣德生还认识到,“一入此途”,不但无益社会国家,且亦自误,至为可惜,这又把实现自我价值提了出来,把洋学历和从政看得不如做一农工,说明了苏南地区的企业经营者自我尊重意识的加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把自身的价值与“社会国家”紧密相联,表明其新价值观的形成。他们已不再是昔日那找不到自身价值的以惟利是图目的的传统商人。

新的价值观造就了这批苏南企业巨擘的新人生观,高成就动机人格在他们身上开始定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具有高成就动机人格的人,他们通常具有关于人类、民

族的一些使命,随着他们性格不断成熟,金钱在他们心中的地位逐渐减弱,而对成就的追求与实现,能给他们带来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并且也只有对越来越高的成就的追求才更有益于公众社会,并能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④应该说,他们不是宗教伦理的禁欲主义者,也不是传统小市民气的手工艺人式的省吃俭用,他们对于金钱物欲的超脱,是因为他们已脱离了低级需求的层次,具有丰富而又高尚的精神情操,具有为祖国和民族着想的广博胸怀。

这批企业家很少满足于既得成就,而永无止境地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这并不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贪得无厌,对此,这批企业家们作出了回答,荣德生曾说:“国内人士均目余为大实业家,实不敢当,倘再尽力十年,各事创齐,理想各点一一实现,庶几或可言大。……国人大多无远大目光,以为余饱暖坐食,终生尽可足用,何必再需若许钱财,不知余别有远见,另图大规模之事业也”。^⑤尽管荣德生没有道明何为“大规模之事业”,但从这批企业家群的身上可以看到,其大规模之事业即为兴实业、保利权,刘鸿生创办火柴厂就是因为他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而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于是,为中国人争气即成为这批企业家的远大目标。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苏南地区企业巨擘们的人格动机,思想境界也是随着他们的积极进取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开阔,有益于国家、民族是他们创办企业的终极目标,在这儿,他们的人格和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通过以上考察,在上海的辐射下,近代苏南地区的思想观念在变!观念的变迁是行为的先导,这些在文化观、社会思潮、精神风貌等方面的影响变化已成为推动苏南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

①《论创行议院事》,《申报》1873年5月9日。

②《礼记·礼运篇》。

③《试行开矿论》,《申报》1874年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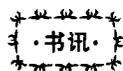
④《论洋求西学》,《申报》1881年6月17日。

- ⑤张一振:《改良婚姻之研究》,《新盛泽》1923年12月1日。
- ⑥《婚姻制度改革谈》,《新黎里》“婚姻问题特刊”,1923年8月1日第6期增刊。
- ⑦《考试西学西法议》,《申报》1889年8月。
- ⑧《论日本留意人才》,《申报》1882年12月24日。
- ⑨见《苏州留学生名录》,《苏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79-270页。
- ⑩转引自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471页。
- ⑪[英]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 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366页。
- ⑬《大公报》(三)1912年6月1日。
- ⑭《重修张堰志》卷一,区域志·风俗。
- ⑮《兰陵自传》,《苏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6页。
- ⑯参见《迈进近代——剪辮与放足》,辽海出版社1997年8月,第139-140页。
- ⑰武进《小河乡志》,1985年版,第345页。
- ⑱《新盛泽》1925年9月1日。
- ⑲《公余日录》卷十。
- ⑳《申报》1933年12月23日。
- ㉑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66页。
- ㉒《大公报》(三)1912年6月1日。
- ㉓民国《南汇县》卷二十,第1页。
- ㉔《申报》“自由谈”,1934年5月8日。
- ㉕《申报》1912年8月9日。
- ㉖《常州市志》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3-544页。
- ㉗徐珂:《可言》卷一,第10页。
- ㉘陆允昌编译:《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16页。
- ㉙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编印,第134-138页。
- ㉚柳亚子:《婚姻改良之浅说》,《新黎里》1926年5月16日,引自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10月。
- ㉛《短评》,《新盛泽》1926年3月21日。
- ㉜1912年12月21日《时报》,附刊,第170页。
- ㉝《申报》1901年6月19日。
- ㉞《申报》1907年12月16日。
- ㉟《申报》1909年11月6日。
- ㊱《申报》1909年6月10日。
- ㊲王韬:《兴利》,《菽园文录外编》,第45页。
- ㊳王韬:《平贼议》,《菽园文录外编》,第192页。
- ㊴王韬:《重民中》,《菽园文录外编》,第22页。
- ㊵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菽园文录外编》,第299页。
- ㊶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1卷,第12页。
- ㊷薛福成:《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记》第3卷,第26页。
- ㊸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3卷,第1页。
- ㊹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1页。
- ㊺夏东元:《郑观应集》,第56页。
- ㊻周庆云:《南浔志》卷三十一,第2页。
- ㊼茅家琦等主编:《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表。
- ㊽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第1672页。
- ㊾严全清:《严廉访遗稿》,“年谱”。
- ㊿参看孙海泉、马俊亚《近代江南地区的资本集团与区域发展》,《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
- ①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8页。
- ②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6年。
- ③[美]马期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页。
- ④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1946年。

[孙海泉: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邮编:221116]

[责任编辑:胡震亚]



《国共和谈秘粹》出版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戚如高主编的《国共和谈秘粹》一书,2002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该书撰写的还有杨智友、胡震亚、夏军等。全书30万字,定价22.00元。

国共合作,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第一次国共合作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至1949年前,处于战前状态的时间只有12年(1927~1936年,1947~1949年),处于非战争的时间却有16年(1921年~1927年,1937年~1946年),两相比较,合作与和平相处的时间反而要长一些。作者依其得天独厚之条件,运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以生动的笔触向读者展现了国共两党和谈的内幕情况与历史史实。欲购者可向《民国档案》杂志社邮购,免收邮费。

(国华)